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刘作丽¹, 贺灿飞^{1,2}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 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 FDI 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 在华 FDI 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 FDI 理论两方面梳理 FDI 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 回顾并评述了在华 FDI 区位研究进展, 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 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 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 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 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 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 FDI 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 FDI 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 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 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 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关 键 词: FDI 区位; 传统因素; 集聚因素; 制度因素; 中国

1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简称为 FDI)区位选择理论不单单是解释企业内各环节活动的区位选择, 随着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复杂化, 还要考虑各环节之间的所有权与组织结构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要正确理解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行为需要整合国际资源配置和经济组织等多方面的理论。已有文献大多是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针对特定问题借鉴相关理论给出相应答案,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未形成 FDI 区位研究的一般性理论^[1-3]。相关文献主要沿两条线展开, 依据区位理论的分析框架讨论 FDI 的区位抉择以及在 FDI 理论分析框架中增加区位因素分析。

本文以在华 FDI 区位研究为基本对象, 主要以下内容展开, 首先探讨 FDI 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 其次综述在华 FDI 区位研究进展; 最后简要评述已有研究并明确其未来研究趋势和方向。

2 FDI 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脉络, 主要从区位理论和

FDI 理论两方面梳理 FDI 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区位理论

2.1.1 传统区位要素

传统区位理论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依据, 一方面强调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成本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十分关注市场规模与潜力对产业活动区位抉择的重要作用; 实证研究表明, 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同样也是 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4-5]。在外资区位研究过程中, 成本方面除了传统区位论中强调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外, 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6-7]。一般认为, 与东道国企业相比, 外国投资者处于“外来者劣势”, 在购买原材料、识别和发现市场机会、获取熟练劳动力以及许多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方面要比东道国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和支付更高的信息成本, 因此, FDI 区位选择通常是对信息成本的一种理性反映。

2.1.2 区位理论的制度转向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地理的文化和制度转向将社会、文化、制度等观念“嵌入”区位研究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区位理论的内涵, 并对 FDI 区位研

收稿日期: 2009-07; 修订日期: 2009-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65)。

作者简介: 刘作丽(1981-), 女, 山东费县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产业和区域经研究。E-mail: lzl_pku@163.com

通讯作者: 贺灿飞(1972-), 男, 江西永新人, 博士, 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和美国地理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产业和区域经研究。E-mail: hecanfei@urban.pku.edu.cn

究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是指把经济自由化作为增长首要引擎、发展迅速的低收入国家^[8],这些国家的正规与非正规制度都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尤其是由中央计划体系向市场经济制度变革^[9-10],转型是其重要特征^[11-12]。

转型经济中制度的不健全致使跨国公司必须适应地方正规和非正规制度所带来的挑战^[13-14],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制度维度区位因子在 FDI 区位选择中意义显著。Wei^[15-16]利用多国总体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贪污腐败持续阻碍外资的进入;Campos 和 Kinoshita^[17]利用 25 个转型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法律和政府当局质量等制度因子是影响 FDI 流动的重要因素。鲁明泓^[1]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便利性四类制度因子对 FDI 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FDI 倾向于流入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经济自由度高、自有财产保护度高、法律完善、企业运行障碍少、政府清廉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

制度差异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像俄罗斯、中国和越南这样比较大的转型国家内部的次区域在政策、态度、价值观念和正规制度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18-20]。

中国内部空间的巨大差异引发了 FDI 区位研究者的兴趣,实证研究发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制度变量对 FDI 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19, 21-23];Du 等人^[24]的研究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更愿意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政府对商业运作干预力度小、政府腐败现象轻和契约执行力度好的省区进行布局。

2.1.3 集聚经济及其新发展

企业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共享、匹配以及学习等微观机制以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25],早在 19 世纪末 Marshall 就指出了集聚经济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26]。相同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被称为地方化经济或马歇尔(MAR)外部性,不同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被称为城市化经济或雅各布斯(Jacobs)外部性。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会根据自身产业特性选择不同集聚类型区位,地方化经济对成熟(传统)产业重要,而现代(或者是高科技)产业和商务服务业则更关注城市化经济^[27-29]。FDI 区位选择也是如此,对爱尔兰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研究发现,城市化经济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区位选择意义重大而地方化经济作用不明显,而低技术产业的区位选择则只与

地方化经济相关^[30]。

近年来,外商投资集聚经济开始在区位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外商投资集聚是指外商投资行为的自我强化效应,该理论认为外资企业可以从位于外资企业聚集的区位获益,已有外资企业的知识和信息溢出、原有产业联系等都可以帮助新投资者克服外来者劣势^[31-32]。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同产业集聚、同源集聚以及同企业集团集聚等多种集聚形式开始出现在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中^[33-35]。研究发现 FDI 的区位行为与其供应商、竞争者或其自身已有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该类研究以对日本、韩国跨国企业的汽车、电子行业的实证居多。

2.2 FDI 理论

FDI 理论(或者说是广义的资本运动理论)是在贸易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却又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主流研究主要有 4 种不同流派:①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研究流派,代表性的成果有 Vernon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66)、Kojima 的比较优势理论/边际产业理论(1973,1978,1982,1990)等。②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不完全竞争(结构性市场失灵)为假设前提的研究流派,代表性的成果有 Hymer (1960,1976)和 Kindleberge (1969) 的垄断优势理论、Kinckerbocker (1973)和 Graham (1978)的寡占反应理论等;③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不完全竞争(自然性市场失灵)为假设前提的研究流派,代表性的成果有 Buckley & Casson (1976,1985,1998,2002)、Teece (1981,1985,1996)、Hennart (1982,1986,1989,1991,1993,2000,2001)、Rugman (1982,1986,1996) 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和 Johanson & Vahlne(1977,1990) 等人的公司国际化过程理论等;④以综合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学派,代表性成果主要是 Dunning(1977,1993,1998,2000,2002,2004)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 理论)等^[3,31,36-37]。FDI 理论大多着眼于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要对外直接投资,并不特别重视国际投资的区位问题,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国际投资理论可以为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2.2.1 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 FDI 理论对区位选择的解释

Vernon 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产品从创新到成熟再到老化,其生产区位也会由美国向欧洲和加拿大进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垄断优势,随着产品的成熟

动力变为东道国的区位优势^[38]。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是新古典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扩展,强调市场需求、生产要素成本决定产业区位,可以很好解释一些制造业的国际投资问题;但对内部化所带来的竞争优势等问题考虑不足,尽管 Vernon 在后续的研究中也提到 FDI 投资过程中要考虑规避组织风险^[37]。Kojima 的比较优势/边际产业理论是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宏观解释,是新古典要素禀赋论在中间产品贸易中的应用;该理论认为 FDI 是有效的中间产品贸易渠道,不同国家的企业有不同的国际贸易和生产模式,FDI 的区位选择决定于区位的产业比较优势,FDI 遵循本国已经或将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39]。

2.2.2 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 FDI 理论对区位选择的解释

Kinckerbocker(1973)和 Graham (1978) 的寡占反应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竞争的结果,寡头公司通常会模仿首先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投资行为(follow the leader)^[40-41]。Vernon(1974) 也认识到了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竞争对区位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寡头垄断发展的三个阶段:创新期寡头、成熟期寡头和衰退期寡头;并认为创新期寡头的生产区位主要集中在产品的创新区位,成熟期寡头生产区位行为主要取决于其主要竞争者的空间行为,衰退期寡头的生产区位则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地理空间差异^[42]。公司过程化理论把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视为一个逐步推进、不断增加投资的过程,过去的直接投资活动及累积的特定区位投资经验决定当前和将来的直接投资区位^[43-45];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46-47]。

2.2.3 OLI 理论对 FDI 区位选择的解释

在 FDI 理论中,Dunning 对区位问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48-49]。Dunning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模型认为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即 FDI 的 OLI 模型^[37,48];其中区位优势是国际投资在何处发生的关键因素,分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因素 4 种类型^[48]。OLI 理论认为企业特定的所有权优势是企业东道国获竞争优势并进行国际生产扩张的必要条件,区位选择中需要考虑在什么样的区位能最大化其所有权优势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带来的收益,实施的是资产开发利用(asset-exploitation)战略^[6, 49-50]。

演化过程理论(evolutionary economics)、基于资源理论(the resource-based view)等相关理论的发展为 OLI 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些理论聚焦现有资产的路径依赖和新资产的累积,强调国际化扩张过程中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的能力不仅在于掌握了某种战略资产,而且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求战略资产才能产生和维持其竞争优势^[51]。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跨国公司的兴起及其国际扩张过程中利用资产增殖(asset-augmenting)和资产寻求(asset-seeking)战略在全球寻求资源以克服其竞争劣势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Dunning 在借鉴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将 asset-exploitation、asset-augmenting 和 asset-seeking 共同纳入 OLI 模型,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区分为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 4 类,并指出不同动机对应不同战略选择和区位指向:资源导向型投资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或是寻求先进技术、管理和组织技能,成本是该类型企业区位选择时要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市场导向型投资是为了跟随供应链、追随竞争者、节省交易成本和适应本地需求,市场环境(包括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商业网络、市场竞争等)是该类型企业区位选择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效率导向型投资是要依据要素禀赋进行全球布局生产,或是利用规模与范围经济进行布局,战略导向型则是为了追求国际一体化的生产战略,获得某些特定资产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在这 2 种类型的投资中,集聚因素和战略资源在区位选择中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37](表 1)。

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解释国际生产的全部内容,不同学派有各自关注的焦点问题,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替代的关系^[37]。上述 FDI 理论与区位理论相互补充、互相融合,共同构筑 FDI 区位选择的理论基础(表 1)。

3 在华 FDI 区位研究进展

在华 FDI 区位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识别其在吸引 FDI 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区位要素,另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内部的区域差异,包括东中西区域尺度、省区尺度、城市尺度以及城市内部尺度差异。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或者是用宏观的统计数据来分析中国利用外资政

表 1 国际生产投资的主要类型及其区位需求

Tab.1 The types and location demand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vestment

动机 (OLI 模型)	类型	相关理论	区位因子
资源导向型	(1)获取自然资源 (2)获取廉价的半熟练或不熟练劳动力 (3)寻求先进技术、管理和组织技能等	(1)基于资源理论 (2)演化过程理论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4)比较优势/边际产业理论	成本要素 (1)生产要素成本 (2)信息成本 (3)……
市场导向型	(1)跟随供应链 (2)适应本地需求 (3)节省交易成本 (4)追随竞争对手	(1)集聚经济理论 (2)交易成本理论 (3)战略联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 (4)寡占反应理论	市场及制度要素 (1)市场规模与潜力 (2)市场联系/市场竞争 (3)制度成本 (4)……
效率导向型	(1)依据要素禀赋进行全球布局 (2)利用规模与范围经济	(1)集聚经济理论 (2)公司过程化理论	集聚要素及战略资源 (1)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
战略导向型	(1)实现国际一体化生产战略 (2)获得某些特定战略资产		(2)外商投资集聚经济 (3)各类战略资源 (4)……

资料来源:根据 Dunning & Lundan(2008)^[37]整理。

策的变化及利用外资水平的发展,分析外资在中国的产业构成、区位分布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52-55];或者是通过具体案例来研究 FDI 的分布模式^[56-57]。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在华 FDI 区位问题,理论基础、内容、方法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下文将对此进行重点梳理。

3.1 影响 FDI 进驻中国的主要因子

首先,asset-exploitation 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主要战略目的,Pak 和 Park 对日本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日资企业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对企业优势资产进行开发利用^[58];其次,获取廉价劳动力、占领市场是中国吸引 FDI 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在 Li & Hu 和魏后凯等人的实证研究中都有体现^[2,59];最后,社会政治稳定、优惠政策、双边贸易、商业文化联系、关税、汇率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60-63]。

3.2 影响在华 FDI 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

中国巨大的地理空间尺度差异以及渐进式改革的制度背景使中国各次区域在利用 FDI 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有学者关注东中西差异,指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因子,而中西部地区则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64];也有学者关注广州、上海等城市内部差异,认为 FDI 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比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更为理性,城市中心、高等级宾馆的可达性、高速公路的可达性等经济要素是主要的区位要素^[64-67];但最受关注的还是省区尺度差异,识别出的区位因子有成本、市场等传统区位因子,制度文化因子和集聚经济因子等。

3.2.1 传统区位因子

在华 FDI 区位研究文献中的大部分都会涉及

成本和市场等传统区位要素,或者是将其作为解释变量重点研究,认为省区的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是 FDI 在中国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区位要素^[68-69];或者是进行其他命题研究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例如 Giner 和 Giner 对制度因素与 FDI 相关关系的研究发现省区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交通基础设施等传统要素作为控制变量会对在华 FDI 的空间选择产生深远影响^[61]。另外,信息成本在在华 FDI 空间区位问题的研究中也受到了关注,研究者认为,信息成本在中国存在区域差异,FDI 的区位选择通常是对信息成本的一种理性反应,外商投资水平、行政管理等级、地理区位以及优惠政策等都是代表信息成本的有效变量^[70-72]。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是在华 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尽管已达成共识,但个别因子的研究结论却仍存在争议,劳动力成本因子表现最为明显。理论上,省区劳动力成本与 FDI 呈负相关关系,大量实证研究证明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 FDI 进入^[68,73-75]。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发现劳动力成本与 FDI 在中国空间分布没有显著相关关系^[21,76-77],甚至呈正相关关系^[78]。之所以出现不稳健的实证结果,有学者认为是因为高工资在中国既是昂贵劳动力成本的象征,同时也是反映生产力和技能的重要指标,只有有效控制了劳动生产率后工资水平才具有可比较性。Wei 等^[70]利用效率工资研究发现 FDI 会避免效率工资较高的省份,鲁明泓^[69]的研究在控制劳动生产率后发现省区的劳动力成本与 FDI 之间存在负向关系,Cheng^[79]也认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劳动力素质的影响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3.2.2 制度文化因子

在转轨背景条件下,中国省区的市场化水平和

开放度等转轨特定要素在在华 FDI 区位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个地区的经济外向度是决定这个地区能吸引多少外资的重要因素^[80-83],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政府各项激励措施、优惠政策是影响 FDI 的重要因子^[54,77,84];而市场化水平也与 FDI 呈正相关关系。He^[85]研究发现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干预以及过紧的财政预算不利于吸引 FDI, Ma 和 Delios^[86]发现日本的跨国公司更愿意选择像上海这样的市场导向型城市而不是像北京这样的政治导向型城市。Du 等人^[24,87]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更愿意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政府对商业运作干预力度小、政府腐败现象轻和契约执行力度好的区位进行布局。

省区网络联系水平对在华 FDI 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网络联系是指经济活动中基于联系和信任建立的非契约关系,可以是与供应商、顾客之间的商业网络联系,也可以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的一种非正式关系。中国利用外资正是通过港资基于网络联系大量进入珠三角拉开的帷幕,很多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上述结论。Leung^[54]在考察珠三角地区香港转包合同活动的生产区位分布模式和经济效益时发现,影响其分布的区位因子主要是血缘关系和已建立的业务联系;李小建^[88]通过对香港企业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发现,个人关系是香港企业投资时所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Chen & Chen^[89]研究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时发现网络联系是重要的区位因子;Zhang^[77]对在华 FDI 区位分布研究时发现历史文化联系非常重要;张维迎、柯荣荣^[90]的研究发现信任对外资引进有明显影响,作为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外商只会垂青于信任度高的省区。

3.2.3 集聚经济因子

特殊的转轨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级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通常会制造各种壁垒阻止其他地区货物进入,外资企业由于“外来者劣势”等影响在获取该地区以外的要素供应时难度较大,因此,区域内集聚经济的发育程度(足够的产业链条)通常是 FDI 区位抉择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的实证研究有两类,一类是探讨静态集聚(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 FDI 区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已有的产业基础、产业技术外溢特别是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是影响 FDI 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70,77,81,83,91];另一类主

要讨论动态集聚效益,也即 FDI 自我强化效益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专业化的供应链等对在华 FDI 的分布有重要影响,但外资由于自我配套以及克服外来者劣势的需要,本身的集聚—跟进投资也即动态集聚效应显著^[21, 80, 83]。

另外有学者通过对交叉变量的研究发现外资集聚可以帮助企业克服区域制度弱势,因此集聚程度在政策环境相对不好的地区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还发现在来自于不同国家的 FDI 在集聚、制度及其交叉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24]。但也有研究发现省区已有 FDI 基础与 FDI 利用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92]。

3.3 影响在华 FDI 区位选择因素的延伸

FDI 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母国的经济、制度和 cultural 特征,东道国的区位环境,产业特征(产品类型)、企业管理方式与组织战略共同影响着 FDI 的区位选择^[37],而时间的演化也会通过对“区域—产业—企业”的影响作用于 FDI 的区位选择(图 1)。因此,在识别在华 FDI 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学者们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的影响。

母国特征所产生的特定优势只有在与东道国特定区位禀赋相结合时才能发挥作用^[93],因此,母国企业特征(战略目标、商业逻辑以及文化背景等)会影响在华 FDI 的分布模式。来自于工业化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主要战略是凭借其技术优势占领中国市场,而来自于新型工业经济体的中小制造业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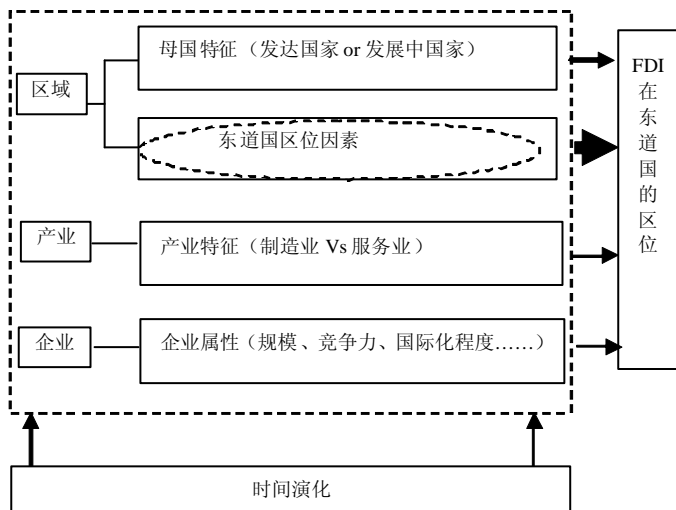


图 1 FDI 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Fig.1 The factors of FDI location decision in host country

业的主要战略是利用中国低成本投入(廉价劳动力等)的优势^[94]。不同战略目标对应不同的产业内容与区位需求,日本、欧美国家的投资集中在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关税等市场导向因素是其考虑的重点,因此偏好于市场比较大的大城市;而香港的投资则更关注劳动密集型部门,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所以偏好于经济特区、沿海城市等区位^[62,95-96]。为了更好地控制住来源国效应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某个特定来源国的在华 FDI 区位选择研究明显增加,主要包括对日本^[74,97]、韩国^[68,75]、美国^[97]以及中国台湾地区^[98] FDI 在中国区位分布的相关研究。

产业属性会影响在华 FDI 区位选择。已有文献多以制造业或整体外资研究为主,很少有专门针对服务业外资区位的研究;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等决定了服务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高度互动与关联性,这种供给方面的独特特征要求跨国公司对服务业和制造业需要采取不同的国际扩张战略。Chadee 等^[96]的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制造业外资,服务业外资更偏好于大型都市区,因为城市地区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为服务业面对面传输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Wu 和 Radbone^[67]对 FDI 在上海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发现不同产业部门的区位偏好不同,服务业倾向于聚集在服务业集聚水平高的地区而制造业则倾向于布局在国家政策优惠的各类开发区中。为了更好地明晰服务业外资区位选择偏好,专门针对服务业外资的研究开始增多,主要有 Hong 等^[99-102]对物流产业的研究、Wang^[103]及贺灿飞和傅容^[104]对银行业的研究等。

企业规模、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权属性质等会影响 FDI 的区位选择。Hong^[100]对在华物流外资企业研究发现,小的物流企业比大企业劳动力成本更为敏感;相比较于独立企业,隶属机构受当地市场需求与劳动力要素影响力弱;独资企业偏好于劳动力成本低的城市而合资企业更强调地方市场需求。Shi^[94]的研究发现小企业喜欢利用廉价劳动力,而大型跨国公司则更试图利用其技术优势。He^[91]认为进入模式会影响 FDI 的空间选择,外商独资企业倾向于布局在外资企业较多、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区域,对开放政策和经济转型的相关因素较为敏感;中外合资企业通常会偏好于大的市场,而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对市场因素不敏感。

FDI 区位因子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转型是中国

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而渐进式改革是转型最为本质的表现形式。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在发生变化,包括来源地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等;同时利用外资的空间范围也在拓展。上述变化导致外商的投资区位偏好发生改变。Sun 等^[92]在研究在华外资区位选择的同时考察了区位因子的时间变化,发现 1991 年以前,劳动力成本与 FDI 呈正相关关系,之后呈负相关;而经济发展水平则在 1991 年以前没有显著相关关系,1991 年以后则高度相关。

4 在华 FDI 区位现有研究评述及未来研究展望

在华 FDI 区位研究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才刚刚起步,但却发展迅速。研究已由最初的定性描述转为利用经济计量模型综合模拟,研究内容也由最初分析影响 FDI 进入中国的原因转向解释其在中国的区域差异,并识别出成本、市场、集聚、制度等区位因子。尽管如此,已有文献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特定空间尺度、特定空间范围和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在华 FDI 区位选择,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在华 FDI 区位选择的一般性理论探讨依然是未来有待解决的课题。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转型经济体中 FDI 区位理论研究。进入新世纪,全球化过程及全球经济地图与几十年前相比变得复杂了很多^[105],在全球性转变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新兴经济体主要包括中东欧的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土耳其,亚洲的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86],转型是上述国家的重要特征^[11-12]。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投资区位有自身规律可循,构建转型经济体中 FDI 区位选择理论非常必要,但目前在华 FDI 区位问题的探讨基本是在 FDI 理论上进行的实证研究,理论探讨不足。如何建立一个探讨转型经济体 FDI 区位决策的一般分析框架是未来研究要完成的课题。

(2) 传统因子与集聚、制度因子之间关系研究。在华 FDI 区位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恰逢经济地理的文化制度转向,理论转向和现实转轨背景决定了制度维度因子从最初就一直

是在华 FDI 区位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集聚经济因子也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传统因子、集聚因子和制度因子的精确标识以及其在在华 FDI 区位决策中的作用程度学界则仍未能达成共识。很多时候三者并不能严格区分,例如在有的研究中将沿海开放城市作为制度文化因子,但它同时也可被设计为传统因子(交通成本因子、信息成本因子等);而城镇人口一方面可以作为集聚经济(城市化经济)变量,同时也可以作为传统市场因子。因此,如何准确标识三者并区分其对于在华 FDI 区位决策中的作用是未来研究中要解决的命题之一。

(3)母国特征、产业企业属性和时间变量对在华 FDI 区位影响研究。如前所述,FDI 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FDI(跨国公司)母国环境、投资产业门类、企业战略等都会影响在华 FDI 的区位选择,同时上述影响随时间推移也会发生变化。已有文献对此虽已开始关注,但仍然不够,特别是对服务业外资区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未来的研究中,区分不同类型 FDI 的区位决策行为、关注“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十分必要。

(4)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 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近年来,随着生产技术和交通、通讯等空间压缩技术的发展以及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自由化改革,跨国公司的生产与组织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生产片段化(价值链上不同功能环节在不同区位布局)作为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改革开放政策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更为产业全面、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机遇,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的提升、转轨的特殊背景以及城市/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基于价值链功能视角研究在华 FDI(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十分必要,但已有在华 FDI 区位研究文献对此部分内容却鲜有涉及。

(5)FDI 区位研究方法的拓展。尽管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在华 FDI 区位研究已由最初的定性描述转为利用计经济模型进行综合模拟,但对定量分析的过分依赖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一方面,对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 FDI 区位问题的进一步深

入准确分析;另一方面,对模型的适用性探讨不够,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会对某些关键区位因素的识别出现相互冲突的论断(像上文提到的劳动力成本)。为增强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与稳健性,研究方法亟需进一步规范及拓展。

参考文献

- [1] 鲁明泓. 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1999, (07): 57-66.
- [2] 魏后凯, 贺灿飞, 王新. 外商投资区位研究的理论前沿及最新进展.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1, (04): 42-52.
- [3] 文余源.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02): 60-73.
- [4] Glickman N J, Woodward D P.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88, 11(2): 137-154.
- [5] Billington N.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1999, 31 (1): 65-76.
- [6] Caves R 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a*, New Series, 1971, 38(149): 1-27.
- [7] Mariotti S, Piscitello L.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 of FDI within the host 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 26 (4): 815-841.
- [8] Hoskisson R E, Eden L, Lau C M et al.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249-267.
- [9] Murtha T P, Lenway S A. 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the strategic state: How natio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ffec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rateg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 113-130.
- [1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Building Institutions for Markets.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2.
- [11] 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Norton, 1990.
- [12] 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 275-297.
- [13] Wan W P, Hoskisson R E. Home country resource environments,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 27-45.
- [14] Meyer K E.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357-367.
- [15] Wei S.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82(1): 1-11.
- [16] Wei S. Local corruption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 *Brook-*

- 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0, (2): 303–354.
- [17] Campos N F, Kinoshita Y. Why does FDI go where it goes? New evidence from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3.
- [18] Child J, Tse D. China's tran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5–21.
- [19] Luo Y. Determinants of entry in an emerging economy: A multilevel approa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1, 38(3): 443–472.
- [20] Meyer K E, Nguyen H V.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Vietnam.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5, 42(1): 63–93.
- [21] Head K, Ries J.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incentive area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6, 40(1): 38–60.
- [22] Cheng L K, Kwan Y K.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0, 31: 379–400.
- [23] Zhou C H, Deliso A, Yang J Y.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1): 63–86.
- [24] Du J L, Lu Y, Tao Z G. FDI location choice: Agglomeration V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08, 13(1): 92–107.
- [25] Duranton G, 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7(2): 343–370.
- [26]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8.
- [27] Henderson J V. *Urban Development: Theory, Fact and Illu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8.
- [28] Jaffe A B, Trajtenberg M, Henderson R.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 577–598.
- [29] Henderson V, Kuncoro A, Tuner 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 1067–1090.
- [30] Barrios S, Gorg H, Strobl E. Multinationals' location choic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ublic incentiv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6, 29 (1): 81–107.
- [31] 贺灿飞.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 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 [32] Shave J. Do foreign-owned and U.S.-owned establishment exhibit the same location patter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 469–492.
- [33] Head K, Ries J, Swenson D.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刊名*, 1995, 38(3–4): 223–247.
- [34] ead C K, Ries J C, Swenson D L. Attracting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agglome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9, 29 (2): 197–218.
- [35] Belderbos R, Carree M. The location of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Agglomeration effects, keiretsu, and firm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2, 16(2): 194–211.
- [36] Faeth I.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tale of nine theoretical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9, 23(1): 165–196.
- [37] Dunning J H, Lundan S M.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nd 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8.
- [38]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2): 190–207.
- [39] 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 Croom Helm, 1978.
- [40] Knickerbocker F. *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41] Graham E M. Transatlantic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 firms: A rivalistic phenomenon?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1978, (1): 82–99.
- [42] Vernon R.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J. Dunning.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Allen & Unwen, 1974, 89–114.
- [43] Johanson J, Vahlne J.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0, 7(4): 11–24.
- [44] Johanson J, Vahlne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 8(1): 23–32.
- [45] Johanson J, Vahlne J. Business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commit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03, (1): 83–101.
- [46] 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1, 91: 75–87.
- [47] Yu C. The experience effec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0, 126(3): 561–580.
- [48] Dunning J H.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xford Economics Papers*, 1973, 25(3): 289–336.
- [49] Dunning J H.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1): 45–66.
- [50] 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investment*. Cambridge, M A: MIT Press, 1976.
- [51] Cantwell J, Narula R. The eclectic paradigm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55–172.
- [52] Kamath S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centrally

- planned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hinese ca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0, 39(1): 107–130.
- [53] Kueh Y 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131 (Special Issue): 637–690.
- [54] Leung C K. Personal contacts, subcontracting linkag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Zhujiang Delta Reg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3, 83(2): 272–302.
- [55] Chen C, Chang L, Zhang Y.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post-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95, 23(4): 691–703.
- [56] Chu D K, Wong G W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 strategies of firms from Hong Kong, Singapore, U.S.A. and Japa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986(Summer/Fall), 35–42.
- [57] Martisons M G, Tseng C S. High-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China: A case-study of the Shanghai success storie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1995, 12(1–2): 111–137.
- [58] Pak Y S, Park Y R.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motives of Japanese invest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5, 40 (3): 254–266.
- [59] Li Y, Hu J L.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2, 19(1): 1–12.
- [60] Liu X, Song H, Wei Y et al.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panel data analysi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7, 133(2): 313–329.
- [61] Giner J M, Giner G. An interpretative mode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n economic policy approach.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 15(3): 268–280.
- [62] Zhang K. Why does so much FDI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go to mainland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3): 293–307.
- [63] Xing Y Q. Why is china so attractive for FDI?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6, 17 (2): 198–209.
- [64] Zhang H Y. What are determinants of FDI location distribution across China? *Proceeding of China Private Economy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Forum*, 2007, 449–454.
- [65] Wu F L. Intrametropolitan FDI firm loc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A poisson and negative binomial analysis.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99, 33(4): 535–555.
- [66] Wu F L. Modelling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irms in a Chinese city. *Urban Studies*, 2000, 37 (13): 2441–2464.
- [67] Wu J P, Radbone I. 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 intra-urba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ghai. *Cities*, 2005, 22(4): 275–286.
- [68] Kim S K, Kim J S. Major determinants of Korean compani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Korea Trade*, 2008, 12(3): 201–220.
- [69] 鲁明泓. 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 *经济研究*, 1997, (12): 37–44.
- [70] Wei Y Q, Liu X M, Parker D et al.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9): 857–867.
- [71] 贺灿飞, 魏后凯. 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 *中国工业经济*, 2001, (09).
- [72] He C. Information cost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29.
- [73] Zeng G J.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choice of FDI to mainland China.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Global Strategies in the 21st Century*, 2004, 1–2: 318–324.
- [74] Xue G, Changchun G.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FDI in China. *Globalization Challenge and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2007, I – III: 1585–1590.
- [75] Kang S J, Lee H S. The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choice of South Korean FDI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7, 19(4): 441–460.
- [76] Braodman H G, Sun X.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World Economy*, 1997, 20(3): 339.
- [77] Zhang K. What attracts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1, 19 (3): 336–346.
- [78] Zhao H, Zhu G. Location factors and country-of-origin differen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DI in China.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0, 8(1): 60.
- [79] Cheng S M. The role of labour cost in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Japanese investors in China.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6, 85(1): 121–138.
- [80] 贺灿飞, 梁进社.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 *地理学报*, 1999, 54(02): 97–105.
- [81] 张长春. 影响 FDI 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管理世界*, 2002(11): 32–41.
- [82] Amarasinghe S, Zeng G J.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Y Mao.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ong Kong: Universal Press Limited, 2004, 174–185.
- [83] 黄肖琦, 柴敏.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 FDI 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06, (10): 7–13.
- [84] Zhang L. 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 and manufactur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south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2): 45–53.
- [85] He C F. Regional decentralisation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18(1): 33–50.
- [86] Ma X F, Delios A. A new tale of two cities: Japanese FDI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1979–200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7, 16(2): 207–228.
- [87] Du J L, Lu Y, Tao Z G.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FDI lo-

- 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US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3): 412–429.
- [88] 李小建. 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 *地理学报*, 1996, 51(03): 213–223.
- [89] Chen H M, Chen T Y. Network linkages and location choic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3): 445–467.
- [90] 张维迎,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经济研究*, 2002, (10).
- [91] He C F. Entry mode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3, 44(6): 443–461.
- [92] Sun Q, Tong W, Yu Q.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2, 21(1): 79–113.
- [93] Dunning J H.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 defence of the eclectic theor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79, 41(4): 269–295.
- [94] Shi Y Z.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trategy of firms: The ca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1, 36(2): 184–204.
- [95] Schroath F W, Hu M Y, Chen H. Country-of-origin effect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3, 24(2): 277–290.
- [96] Chadee D D, Qiu F, Rose E L. FDI location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A study of EJV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3, 56(10): 835–845.
- [97] Cheng S M. How can western China attract FDI? A case of Japanese investment.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8, 42(2): 357–374.
- [98] Aw B Y, Lee 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Taiwanese multinationa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5(1): 167–179.
- [99] Hong J J, Chin A. Modeling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ese logistics industry.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7, 18(4): 425–437.
- [100] Hong J J. Firm-specific effects on loc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Regional Studies*, 2007, 41(5): 673–683.
- [101] Hong J J. Location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s of foreign logistics services in Shanghai, China.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7, 27(4): 339–354.
- [102] Hong J J. Transport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logistics firm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07, 41(6): 597–609.
- [103] Wang X. The determinants of multinational banks presence in China.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Global Strategies in the 21st century*, 2004, 1–2: 909–917.
- [104] 贺灿飞, 傅蓉.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地理学报*, 2009, 64(06): 701–712.
- [105] Dicken P.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21st centu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A Literature Review on FDI Location

LIU Zuoli¹, HE Canfei^{1,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no gener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location theory,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studies do help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Location theory and FDI theory are the two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bases of FDI location research. China as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country, the issue about its FDI location choice had become a hot topic in many field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features,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existing studies on FDI location in China.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 of early studies. Since the mid-1990s, the research focuses were shift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FDI location decision us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provincial scale and identified location factors included costs, markets, agglomeration, institution, etc. FDI location decision in host country is the interacted result of region-industry-enterprise factors, therefore there are other factors—including the country of origin,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volution factors—work besides the host country's location factors.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questions deserving further research, including discussing the general location model in merging economies, strengthening region-industry-enterpris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ocation of different functions of FDI in China.

Key words: FDI location; classic factors; agglomeration; institution; China